

新出唐高昌王族鞠嗣良及夫人史氏墓志研究

郑旭东 郑红翔 赵占锐

【摘要】鞠氏曾为高昌王族,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后被内徙至中原。鞠氏入唐后,很快融入唐朝的官僚阶层,并深度参与了唐廷的政治。新出的高昌王族鞠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给我们提供了鞠氏在唐朝活动的诸多信息,不仅有史籍阙载的家族历代人物之封号、职官等内容,还隐隐透露了志主鞠嗣良及其父在武则天称制及立储的重大事件中起过核心作用。夫人史氏为突厥名将史大奈之孙,她的墓志不仅能补充鞠嗣良及史氏家族的信息,其中关于婚姻的记载也揭示了边疆民族入唐后作出的身份转变及高门望族为维系家族地位组建的联姻关系。

【关键词】唐代;高昌;武周政权;鞠氏家族;史氏家族

【作者简介】郑旭东(1987-),男,陕西省合阳县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12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陕西 西安 710068);郑红翔(1988-),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隋唐史、西北历史地理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9);赵占锐(1985-),女,陕西省西安市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陕西 西安 710054)。

【原文出处】《敦煌研究》(兰州),2023.1.11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蕃关系视野下的唐朝经营西域研究”(20CZS022)。

2019年唐高昌王族鞠嗣良与夫人史氏合葬墓在陕西咸阳周陵镇崔家村被发现。其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有五个天井,有围沟。在墓道、天井、过洞和甬道的两壁保存了精美壁画。墓中出土了2合墓志:《大周故正议大夫行水衡都尉上柱国滕国公鞠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正议大夫行水衡都尉上柱国滕国公鞠府君夫人史氏墓志铭并序》,即为鞠嗣良和其夫人史氏的墓志^①(图1、图2、附图1、附图2)。鞠嗣良墓志记载:“君讳嗣良,字承嘉,(略)曾祖文泰,随[隋]冠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高昌郡王”;史氏墓志记载:“祖大奈,随[隋]金紫光禄大夫、并州留守”。因此可知鞠嗣良为高昌王鞠文泰曾孙,夫人史氏为唐初突厥蕃将史大奈之孙。两合墓志记述了鞠、史两家族的人物谱系(图3)、入仕转官、婚姻情况、经历史事、死后赐赠、宅邸葬地等内容,补充了两大家族在史传中的记载。鞠、史两族为隋唐时期政治史上的重要家族,其殊途同归于唐政

权中,参与了唐初至武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家族命运也随着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而波澜起伏。本文试对两合墓志进行初步考释研究,以鞠、史两族经历为线索,探索唐初至武周时期的政局变动。

一、隋唐之际的鞠氏家族

《元和姓纂》记载鞠氏郡望有西平和金城之说,“西平”有王族鞠嘉、鞠伯雅、鞠文泰,“金城”有西晋左仆射鞠允。《元和姓纂》同时还记载西汉哀帝时鞠潭(谭)受东平王刘宇谋反被贬为庶民,进而率子鞠闭避难湟中,移居西平,改“鞠”为“鞠”,鞠嘉为鞠闭十一代孙^[1]。有研究综述写道:东汉末鞠氏已从西平发展到金城,并在两地形形成各自的郡望,时有金城鞠胜、西平鞠演。随后西平的鞠演、鞠光和鞠英分别三次起兵反叛曹魏政权,均被镇压,而金城鞠氏反抗较少,保存了实力。西晋立国后金城鞠允等参加了保卫晋室的斗争。十六国时期鞠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之后金城、西平鞠氏随北凉沮渠氏徙入高昌^[2]。



图1 鞠嗣良志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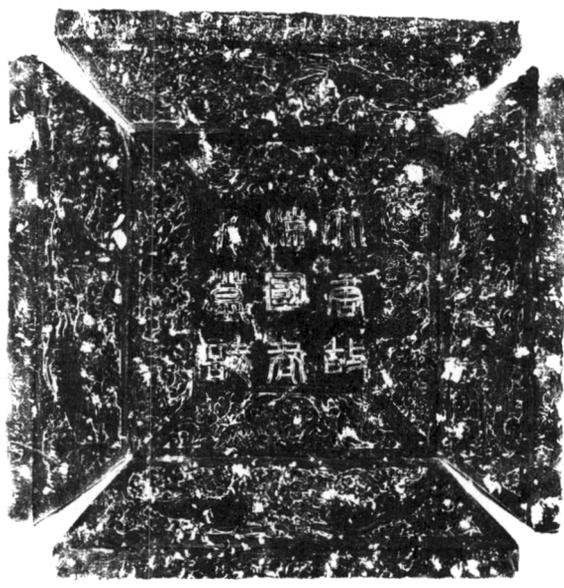


图2 史氏墓志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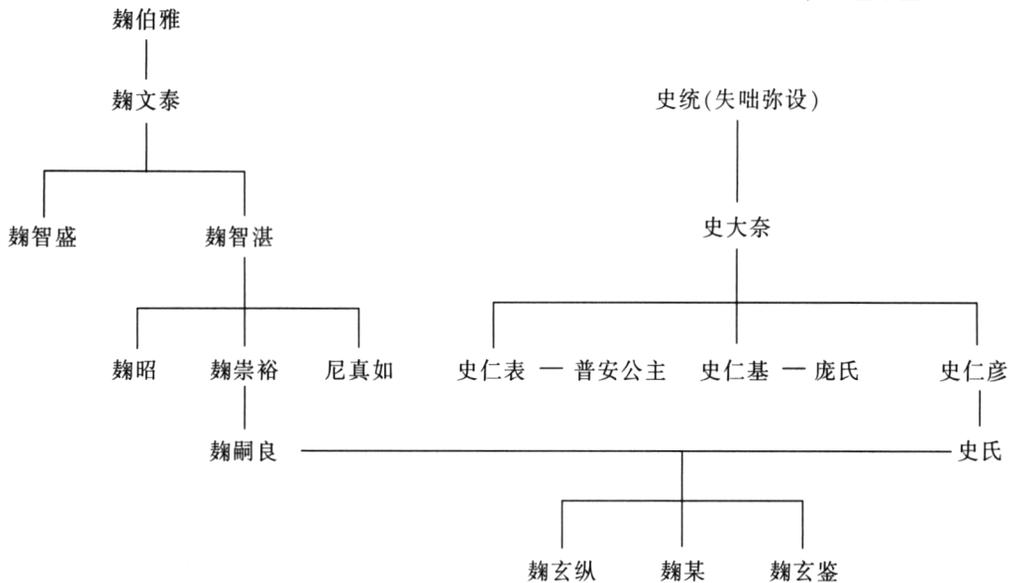


图3 鞠嗣良夫妇家族谱系²⁾

《魏书》记载鞠氏首位高昌王鞠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3]。王素先生结合吐鲁番文书考证认为金城鞠氏为鞠氏王朝的中央贵族，即王族，而西平鞠氏为地方贵族^[4-5]。然而施新荣先生根据吐鲁番地区出土墓砖考察得出高昌地区的鞠氏郡望均是金城^[6]。鞠嗣良墓志却记载：“其先西平郡人也。”此或提出了鞠氏王族郡望研究的新方向。

史载隋大业八年(612)十一月高昌王鞠伯雅因跟从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其还尚宗室女华容公主，并令有雅望的苏夔主婚^[7-8]。华容公主，为宇文氏之

女，名讳玉波^[9]。当时鞠伯雅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唐武德二年(619)伯雅死，子文泰继立为高昌王，并遣使告哀于唐廷，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武德七年(624)鞠文泰献拂菻狗。太宗继位后，鞠文泰与其妻宇文氏复贡玄狐裘、玉盘，唐廷以花钿一具回赐宇文氏^[10]。贞观四年(630)鞠文泰来朝，其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太宗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10]5294[11]}。

隋末唐初鞠氏父子积极与中原政权交善，应与高昌国内发生的“义和政变”相关。政变导致鞠伯雅

失国六年,只能赴西突厥避难,直到“重光复辟”后,伯雅才重掌高昌政权。发动政变的亦是魏氏家族,如新见墓志志主魏建泰一支,政变失败后其逃亡中原,投靠唐王朝^[12]。当时高昌与西突厥勾结并建立军事联盟,阻断丝绸之路贸易,攻击丝路商队和往来使臣,威胁到唐朝的利益安全。因此魏文泰诸多不臣举动就成为唐廷出兵征讨之名由,《讨高昌王魏文泰诏》即称“宜顺夷夏之心,以申吊伐之典,讨凶渠之多罪,拯无辜之倒悬”^[13]。

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下诏,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为副大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为行军总管,姜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领汉兵和突厥、契苾步骑数万,行军六军,以征讨高昌国^{[8]6150[10]2334[14-16]}。贞观十四年(640)魏文泰闻唐廷大举起兵西征,兵锋直抵破口,惶骇无计,发病而死。魏文泰死后,子魏智盛被立为高昌王。其年八月,侯君集克高昌,智盛穷蹙而降,魏氏高昌国亡^{[8]6154-6155[14]40}。

高昌平定后,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廷在其地设西昌州,其年九月改为西州,置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高昌城为西州治所,交河城为安西都护府治所。西昌州属羁縻州^[17],而西州则属于正州,直接受唐朝管理。史载末代高昌王魏智盛及群臣被侯君集俘虏而还献于观德殿,太宗将其众迁徙中国,分别安置于长安和洛阳监管。魏智盛拜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其弟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

史传记载高昌灭国后,魏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魏氏家族在高昌地区支脉庞杂,成员众多,所以仍有一部分与王族支脉较远的魏氏成员留在了当地。在吐鲁番地区已经发现了唐西州时期魏氏家族的墓砖,如贞观十六年(642)魏氏墓表、魏法台墓砖、魏文姿墓砖,开元三年(715)魏达女魏娘墓志铭^[18]。魏智盛为魏嗣良祖伯父,入唐后拜武职禁军将军,封郡公。贞观十八年(644)唐军东征高句丽时,魏智盛为八位行军总管之一,隶属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14]608}。隋代和唐初行军远征时常有蕃将或附属国主领兵从之,以补充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不足,同时彰显王朝的影响力。魏智盛和魏伯雅能

参与东征高句丽,是中原王朝对其的宠信和拉拢。《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10]5296}在唐昭陵的考古发掘中,已经找到魏智盛的蕃君长石人像及刻字像座残块,上刻“高昌王左武威将军魏智勇”,魏智勇是魏智盛之误刻^[19]。

二、魏嗣良家族考

魏嗣良墓志记载:曾祖文泰,隋冠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高昌郡王;祖智湛,唐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天山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使持节、凉甘瓜肃伊沙六州诸军事,皇朝赠越婺二州刺史;父崇裕,皇朝镇军大将军行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卫大将军、交河郡王、食邑三千户。

魏文泰获隋朝赐官冠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以及高昌郡王之封号,不见史传记载,志文可补史缺。魏嗣良祖父魏智湛,乃末代高昌王魏智盛之弟。志文载其为唐朝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使持节、凉甘瓜肃伊沙六州诸军事等职,可以看出高昌灭国后唐廷还以魏氏王族拜官故地。《唐会要》载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十一日置瑶池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至永徽二年(651)正月二十五日,贺鲁以府叛,自称沙钵罗可汗,据有西域之地^{[11]1567}。史载永徽二年十一月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魏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西)州刺史,前往镇抚^[20]。阿史那贺鲁叛乱发生后,唐廷派高昌王族后裔魏智湛回故地镇抚。麟德年间(664-665)魏智湛仍以左骁卫大将军为西州刺史,卒后赠凉州都督^{[10]5297[14]6223},其不再兼任安西都护是因为显庆三年(658)西突厥被灭后,安西都护府西迁至龟兹。魏智湛能被唐高宗派遣回高昌故地任职,足见其已经深受唐廷信任,故堪此重任。永徽二年魏智湛与一批高昌国被徙成员重回故地,这对安抚高昌遗民应有积极作用^[21]。同其兄一致,魏智湛的石像被立于唐乾陵^[22]。

1985年西安曲江三兆村曾发现《大唐甘露寺尼真如塔铭》,尼真如总章二年(669)为亡父魏智湛出家,其年三月廿二日亡故,上元三年(676)三月十七日立塔于明堂樊川之原。塔铭记载尼真如曾祖魏伯雅为高昌献文王,祖魏文泰为高昌光武

王,父翽智湛为皇朝左骁卫大将军、西州都督、上柱国、天山郡开国公^[23]。尼真如为亡父翽智湛出家,可见其对父祖感情之深。塔铭直接使用了翽伯雅和翽文泰的谥号,这与留居西州的部分高昌遗民墓志中称翽文泰为“我君光武王”之意相似,表达了对故国的追念^{[21]44}。翽嗣良墓志记载翽智湛最终赴职于京兆,可知智湛最后还是卒于长安,卒年不晚于总章二年。

史载翽智湛有子翽昭、翽崇裕。翽昭,好文学,善文章,历司膳卿。翽昭弟翽崇裕,也是翽嗣良之父,有武艺,永徽年间为右武卫翊府中郎将,天授初为左武卫大将军,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户,终于镇军大将军^{[10]5296[14]6223}。《唐会要》将翽崇裕误载为翽崇税^{[11]2019}。翽崇裕还著有《翽崇裕集》20卷^{[14]1601}。嗣良墓志可补翽崇裕在禁军中的任职: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卫大将军。

1973年在甘肃榆中发现交河郡夫人墓,并出土墓志残块。早期考证此交河郡夫人名讳是慕容仪,字辅贤,亡于690年—700年之间,生子朝议郎守太仆卿、荣国公、左武卫大将军翽嵩,其夫为翽崇裕^[24],然后有专文指出慕容仪之夫并非翽崇裕^[25]。现在从翽嗣良墓志看,志文虽不载嗣良外家,但一般情况下唐代家族中母子之墓不会分隔极远,同时嗣良夫人史氏墓志载嗣良去世后,“太夫人在堂,(史氏)而能肃奉晨昏,终始无倦”,可见翽嗣良母亲与儿子、儿媳同居,享寿较长,慕容仪墓志中又不载翽嗣良,故可以基本肯定慕容仪不是翽崇裕之妻。

志主翽嗣良受父祖之余荫,墓志载其15岁时就为太子通事舍人,寻加殿中省尚乘直长,又改授朝散大夫行尚辇直长,以清勤著称,后又除尚衣奉御,恩勅又令右羽林卫押飞骑宿卫,未几又改授水衡都尉。不久丁父忧去任,但被夺情擢水衡都尉,又除明威将军行右鹰扬卫郎将。嗣良请求回乡尽孝,寻以有旧于国,加上柱国并袭封滕国公,食邑三千户。圣历元年(698)四月廿九日终于神都正俗里之私第,春秋三十九。其死后受到敕吊并赐衣物,先葬黑水之园茔,久视元年(700)五月改窆于咸阳县之北原。从志文可推翽嗣良生于显庆五年(660)。翽嗣良一生历官丰富,涉及殿中省管理舆服之职的尚辇直长、尚衣奉御,禁军武将的右羽林卫押飞骑宿卫、明威将军行右

鹰扬卫郎将,以及都水监之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的水衡都尉^{[10]1897}。

翽嗣良墓志载其仅一子:玄纵,而夫人史氏墓志载有三子:玄纵、玄某、玄鉴,且玄纵为左金吾卫勋行府右果毅都尉、滕国公。在两《唐书》中均载翽崇裕死后封爵遂绝,且对翽智湛的爵号为天山县公还是天山郡公有不同记录^{[10]5296-5297[14]6223}。现在从翽嗣良夫妇墓志可知,翽崇裕死后其交河郡王的封号虽已绝,但是翽嗣良又因有旧于国而新获封滕国公,且滕国公之号为其子翽玄纵所袭。嗣良和夫人墓志也明载翽智湛为天山县公,这或有从县公升为郡公的一个过程。

三、嗣良父子与武周政局

垂拱四年(688)七月以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为首的李唐宗室起兵反叛武则天当政。《旧唐书》记载:

则天命左豹韬卫大将军翽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十万讨之,仍令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于是制削贞及冲属籍,改姓虺氏。崇裕等军至蔡州城东四十里,贞命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规等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门自守……贞乃饮药而死。家僮方始一时散,舍仗就擒。规亦缢其母自杀,守德携良乡县主亦同缢于别所。翽崇裕斩贞父子及裴守德等,传首东都,梟于阙下。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10]2662}

翽崇裕是镇压李贞父子叛乱的主帅,岑长倩为副帅。翽崇裕在永徽时仅为右武卫翊府中郎将,此后30年不见其转迁记载。高宗统治后期,李唐旧臣遭到持续打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起的官僚,从边疆入唐的翽崇裕也抓住机遇得以升迁。武则天称制后,李唐宗室与唐朝旧臣掀起一阵阵的反抗,而在这个关键时刻,翽崇裕站到了武则天一边,为她平息了越王李贞等人的叛乱。这样的功绩对武周政权来说是巨大的功勋,所以崇裕不仅做到了左武卫大将军,还被封为交河郡王,食邑三千户。唐初,公主的封邑也仅有三百户,可见武则天对他的重视。因为翽崇裕对武周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恩荫同样惠及他的子嗣。咸亨五年(674),翽嗣良在15岁时就能凭借父荫初仕太子通事舍人,而且仕途非常顺利,在短时间内频繁得到晋升。翽崇裕父子是

武则天革唐命、建周立国的重要支持者,其家族在武周时期飞黄腾达。崇裕死后,武则天为其举哀,辒以美锦,赙赐甚厚,可见家族的发展与武则天称帝非常密切。

鞠嗣良墓志铭曰“辅嗣暴终”,夫人史氏墓志记载嗣良遭此凶,早世而殒。夫人墓志又载鞠嗣良死后命第三子玄鉴剪发出家,学金仙之道。曹魏时期的经学家王弼字辅嗣,其于正始十年(249)受牵连于曹爽一案去职,其年秋遭痲疾而亡,年仅24岁^[26]。唐代墓志也多见以辅嗣代指早亡者,如吴续墓志、李延祜墓志^[27-28]。鞠嗣良墓志不见其患病记载,当为突然而逝,加上夫人史氏墓志中的“遭此凶”等内容,可以猜测鞠嗣良应是遭到了重大厄运打击而早逝。

鞠嗣良死于圣历元年四月,当时正值武则天选择继位人的关键时期。圣历元年三月则天诤言庐陵王有疾,密召李哲与妃、诸子回神都洛阳。八月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怏怏病亡。九月皇嗣李旦固请逊位于庐陵王李哲,太后许之并即立庐陵王为太子,复其名李显,赦天下,又令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默啜^{[8]6529-6534}。嗣良志文载:“负王佐谋猷,有天生智略。方期北面献寿,西掖参机,运日月之灵舒,立宇宙之纲纪。”嗣良在这个关键时刻而暴终,或许与皇位继承人选择有关。其墓志中“北面献寿”“立宇宙之纲纪”或可推测是鞠嗣良借献寿之名力劝则天立继承人。圣历元年四月李显已经被武则天确定为继承人,当年八月武承嗣病亡^[29]。从当时因推举继承人遭祸而亡的结局可反推嗣良所荐之人绝非李显和武承嗣二人,为武三思或其他武氏成员的可能性亦不大,否则鞠嗣良墓必在玄宗朝被毁,殁于开元年间的史氏能建墓与嗣良合葬也就不可能,极有可能鞠嗣良当时所推举的继承人应为皇嗣李旦,从而触逆了武后。李显于嗣圣元年(684)被废为庐陵王,十几年来凄惨度日,周围已经没有个人政治势力。李旦虽从皇帝被降为皇嗣,处境艰难,但是与李显相比其政治生涯从未中断,也没有远离都城,同时李旦周边集聚了一批拥护者,如以命为其证清白的安金藏^{[14]5506}。武则天为了保证其百年后政权由李武联合控制,而不是李家立刻彻底清算武氏,一定会选择孤身的李显为继位人,李旦的逊位之请则是必须要

有政治表演的过程。所以鞠嗣良积极迎立李旦的行为必然触怒武后,惨遭不测。

岑长倩与鞠嗣良父亲一起镇压李贞父子叛乱,其早在天授二年(691)因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大忤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中路召还,下制狱,被诛,仍发掘其父祖坟墓”^{[10]2539}。可见皇位继承人的争夺是武周朝最激烈的政治斗争,即使是武则天“革命”的支持者,一旦卷入亦遭其祸。

久视元年鞠嗣良迁葬咸阳北原,其第三子鞠玄鉴出家修道,或为避难行为,嗣良之死给鞠氏家族造成了沉重打击。嗣良墓志不载鞠玄纵继承父爵,直到夫人墓志中才有玄纵官职、爵位的记载,其原因或为嗣良支持李旦而暴卒,当权者不会允许玄纵袭爵为官,或为嗣良死时玄纵尚年幼,开元时武氏家族已倾倒,玄纵也已成年,方才能为左金吾卫行府右果毅都尉、滕国公。

四、夫人史氏家族

墓志载夫人史氏,河南洛阳人,凉国夫人。夫人卒于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廿四日,春秋六十三,因此可上推史氏生于龙朔二年(662)。曾祖史统,隋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祖史大奈,隋金紫光禄大夫、并州留守,后投靠李渊集团建国,以功初授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上柱国、窦国公,食实封五百户,薨赠辅国大将军,谥曰襄,配食太宗庙;父史仁彦,唐朝散大夫行贝州郟县令,史氏为仁彦第二女。史大奈,史传有载,其经历丰富,堪称隋唐之际叱咤风云的人物。

史大奈出身突厥,其世系文献记载混乱。《旧唐书》载隋炀帝大业中处罗可汗与其弟阙达设及特勤大奈入朝,仍从炀帝征高句丽^{[10]5180}。《新唐书》只载“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勤(勤)也,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14]4111}依《旧唐书》之言,处罗可汗有两弟,即阙达设和史大奈,但《新唐书》却不载史大奈与处罗可汗的关系。《元和姓纂》记载:

(河南)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罗次汗子,生苏尼失。入隋,封康国公、怀德郡王。生大奈,子仁表,驸马。生忠,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忠生晞,宋州刺史。晞生思元,右金吾大将军。^{[1]825}

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校记中推断“科罗次汗子”乃“科罗汗次子”之讹，且阿史那单称史者，纪年文献最早见于史大奈。《元和姓纂》文意似史大奈为苏尼失之子，但是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勤，与苏尼失为东突厥支系相异；早在大业七年（611）史大奈和处罗就已经入隋，而苏尼失要到贞观四年才投降李唐，前后相差廿载于理不合，康国公或为史大奈入隋时所授。史大奈所出，史已不详^{[1]826}。朱振宏先生考证出史大奈为处罗可汗大弟或堂兄弟^[30]。敦煌写本S.2078号文书之“习字”的范本乃是史大奈的碑文，研究者已经对其进行文字校订和考释，碑文开头部分并不完整，但可以释读出史大奈祖父是莫贺可汗，推测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处罗侯，处罗侯为东突厥可汗。碑文又曰史大奈父亲是失咄弥设，突厥宗室子弟为特勤、设，典兵与否是其区别。史大奈碑又明确记载其武德元年（618）被封为康国公^[31]。

鞠嗣良夫人史氏墓志称史大奈父亲为史统，这与史思光墓志记载基本相同。史思光为史大奈孙，墓志载其曾祖统，隋光禄大夫；祖大奈，太原元从功臣第一等，右卫大将军、上柱国、窦国公，赠辅国大将军，食渠州实封五百户；父仁基，左右金吾将军、绵华宁三州刺史、上柱国、乐陵县开国侯。史仁基夫人为左金吾大将军、濮国公庞卿恽第六女^[32]。史统与史大奈碑所载失咄弥设理应是同一人，其汉名或曰：统^[33]。

史氏墓志载史大奈为隋朝并州留守，史大奈碑亦载大业十二年（616）奉诏率所部屯晋阳。隋末史大奈屯兵晋阳，应与李渊有交往。两《唐书》和史大奈碑均载大奈追随李渊起兵，即史氏墓志所言：“我唐有命，首接义旗，契叶归周，功参起沛。”大业十三年（617）九月李渊军队和隋将屈突通在潼关相遇，屈突通派将领桑显和袭击刘文静部。“文静度显和军稍怠，潜遣奇兵掩其后，显和大败，悉虏其众。”^{[10]2292}“奇兵”是指《旧唐书》所载的“隋将桑显和袭击于饮马泉，诸军多已奔退，大奈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拜光禄大夫”^{[10]5180}，《新唐书》亦有此言^[34]。《旧唐书·柴绍传》载：“隋将桑显和来击，孙华率精锐渡河以援之，绍引军直掩其背，与史大奈合势击之，显和大败，因与诸将

进下京城。”^{[10]2314}说明此战还有孙华和柴绍的参与。平长安后，史大奈以功赏帛五千匹，赐姓史。唐建国后，史大奈继续征战。武德初跟随李世民破薛举，故其碑载武德元年累积战功进封康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缗一千段等，武德三年（620）授右翊卫将军。之后史大奈又从李世民破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并有殊功，赐宫女三人，杂彩万余段。贞观三年（629）累迁右卫武大将军。贞观四年唐太宗击败颉利可汗，五月置丰州都督府，史大奈为都督。后封大奈为窦国公，食封户三百，卒后永徽五年（654）赠辅国大将军^{[8]6078[10]5180[11]938}。嗣良夫人史氏墓志可补史大奈曾为左卫大将军和凉州都督之职，且志文载食实封五百户。史大奈卒年据考为贞观十一年（637），葬于贞观十二年（638）^{[31]177}。史大奈死后配食太宗庙，碑文记载其葬于礼泉县神迹乡，大奈以功陪葬太宗昭陵^{[11]481[34]}。

史大奈子史仁表，尚太宗女普安公主为驸马都尉^{[14]3646}；史思光墓志载大奈另一子史仁基为左右金吾将军、绵华宁三州刺史等职；而鞠嗣良夫人史氏的父亲史仁彦，仅为朝散大夫行贝州郟县令，仕途逊于仁表和仁基。夫人史氏墓志盖载其为凉国夫人，且志文中并未提及，鞠嗣良墓志也没有此记载，推测凉国夫人之封号应为史氏卒后所追赠，或与其出身西北突厥家族有关。墓志载鞠嗣良卒于神都正俗里，夫人史氏终于京兆务本里，可见鞠氏家族在唐两京均有宅邸。

鞠氏家族从伯雅、文泰时起就联姻中原政权。鞠智盛、鞠智湛婚姻不见载于史籍，他们活动于高昌亡国前后时期，娶妻应不例外为高昌高门或西域望族。交河郡夫人慕容仪出身鲜卑裔，嫁与高昌鞠氏家族，突厥出身的史夫人为鞠嗣良之妻，这种边疆民族入唐后相互联姻成为中古时期婚姻关系的一种模式。史大奈家族与皇室联姻，同鞠氏家族、庞卿恽家族结亲。庞卿恽跟从李渊晋阳起兵，参与平定薛举父子、王世充等战争，归身秦王府，玄武门之变亦有其身影，可以看出庞卿恽与史大奈经历极其相似，乃均以武力著称的唐元从功臣。武将家族在唐初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鞠、史、庞三家通婚，也是高门望族互相联姻构成家族关系网络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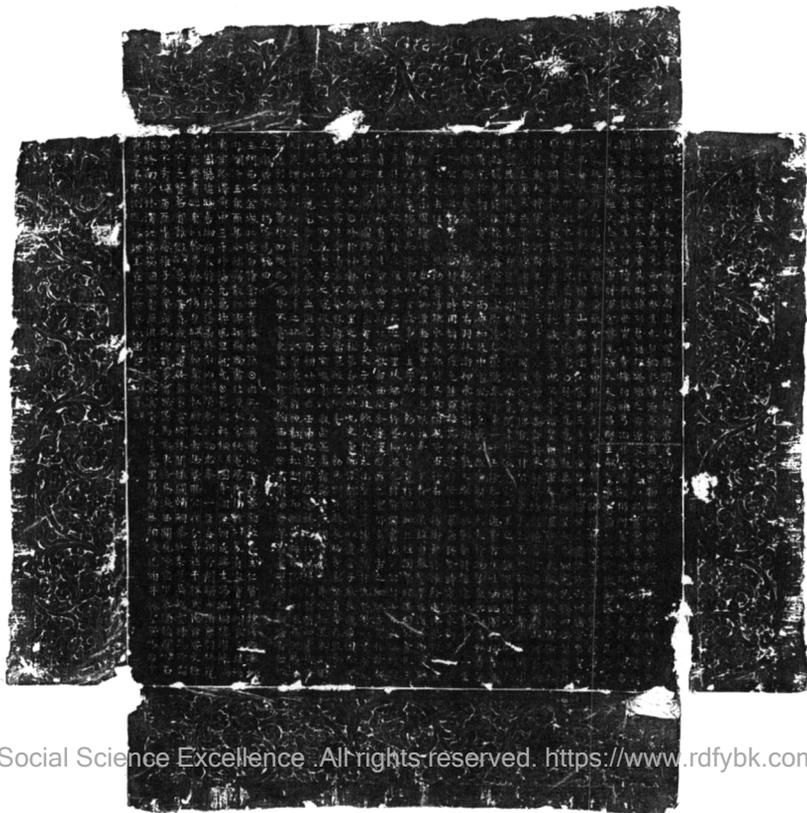
五、结语

鞠嗣良夫妇墓志描述先祖时,均有类比汉朝人物的现象,这表明两族入唐后对中原文化的逐渐接受和投靠。鞠氏家族和史氏家族在隋朝时就均已入朝拜官,和中原王朝来往频繁,都参与过炀帝东征高句丽。入唐方式上,鞠氏家族是国灭被俘,而史氏家族则为唐元功臣。虽然入唐方式不同,但两家族均活跃在初唐政治舞台上,参与了重要的军事活动。鞠文泰死于侯君集率军西征、高昌国将亡之时。鞠智盛为高昌末代国主,被俘入唐后为禁军将军并参与太宗东征高句丽,鞠智湛在高宗时期曾回故地西州任职并最终返回长安,兄弟二人皆有功勋于唐廷,其石像被分别立于昭陵和乾陵。这反映了唐朝对鞠氏王族遗民的拉拢和信任。鞠智湛之女尼真如塔铭敢明记鞠伯雅、鞠文泰谥号,这同当时内地和西州高昌遗民墓志中明载对故主、故国的追念相似,亦是唐朝对高昌遗民较为温和民族政策的展现。

高宗朝后期到武周时期,鞠崇裕因领兵镇压越王李贞父子叛乱而大获封赏,官拜左武卫大将军,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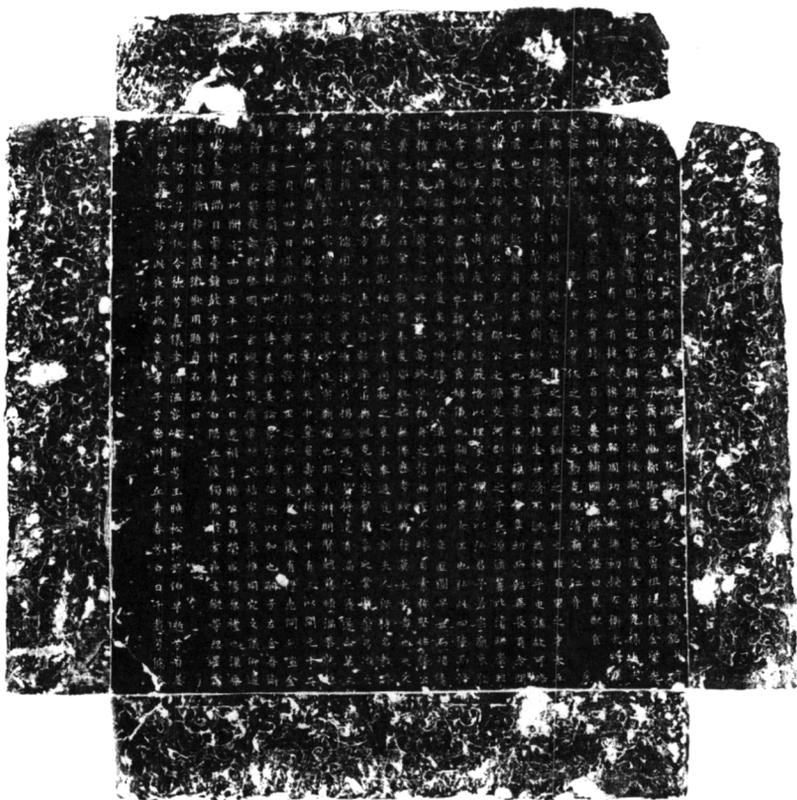
爵交河郡王,食邑三千户,其子鞠嗣良也得以在15岁时就成为太子通事舍人。说明在高昌国遗民逐渐故去,高昌国历史记忆逐渐淡化的时候,鞠崇裕坚决地投靠了武则天,成为武周政权的有功之臣。但在武后择立太子的事件上,鞠嗣良站到了李旦一边,因此其在盛年39岁时就惨遭暴卒而亡。鞠崇裕、鞠嗣良父子的经历是,高宗和武周时期亡国降将置上层权力斗争、参政意识加强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个鲜活个案,他们已经从单纯的军事活动中跳脱出来,以军事活动为基础站队于不同政治阵营,参与权力争夺^[35]。

史氏家族以史大奈称著,历经隋唐两朝,为唐建国元从功臣第一,死后配食太宗庙,陪葬昭陵。史大奈三子分别与皇室、武将庞卿恹和高昌王族鞠氏联姻,复杂的婚姻网络可以维系史氏家族政治地位不衰,当然史氏家族能与鞠氏结亲或有两家族同来自边疆的地缘因素。鞠、史、庞三家联姻也都是唐初武将家族地位尊崇,是中古时期望族之间互通婚姻的实例。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com/>

附图1 鞠嗣良志石



附图2 史氏志石

注释:

①唐鞠嗣良夫妇墓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本文所引鞠嗣良夫妇墓志拓本照片为该墓葬发掘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提供。文中鞠嗣良和其妻史氏墓志内容系本文作者根据其墓志拓本照片释读。本文中鞠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仅首次出现时用志石首题并加书名号,其后简称鞠嗣良墓志、史氏墓志,其他碑刻文献也多以简称指代。

②此图由本文作者根据鞠、史两家族的碑志及相关史传文献绘制。

参考文献:

[1]林宝.元和姓纂[M].岑仲勉,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1434-1436.
[2]董华锋.汉唐金城、西平魏氏研究[J].西域研究,2008(3):10-20.
[3]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8:2429.
[4]王素.吐鲁番文书与两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J].文史知识,1992(8):20.
[5]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氏族谱》初探[J].新疆文物,1992(1):15-28.

[6]施新荣.也谈高昌魏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J].西域研究,2001(3):53-63.
[7]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91,1847,83.
[8]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5666.
[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西州[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031.
[10]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4.
[11]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15.
[12]王素.唐魏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M]//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7-164.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昌王魏文泰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702-703.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21.
[15]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22-435.
[16]李宗俊.《唐萨孤吴仁墓志》与雁门萨氏源流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76.

[17]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M]//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4-115.

[18]张铭心.吐鲁番出土墓志汇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90-193,294.

[19]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M]//碑林集刊:第10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82-88.

[20]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91:外臣部三十六:备御第四[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478.

[21]裴成国.故国与新邦:以贞观十四年以后唐西州的砖志书写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5):47.

[22]樊英峰.乾陵61蕃臣像补考[J].文博,2003(3):57.

[23]杨兴华.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J].文博,1987(5):81.

[24]孙永乐.交河郡夫人墓·高昌·吐鲁番:兼述高昌与中原的关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2):13-19.

[25]周伟洲.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M]//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5-89.

[26]陈寿.三国志:卷28:钟会传[M].陈乃乾,校点.北

京:中华书局,1959:795.

[2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68.

[28]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景龙01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38.

[29]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6):58.

[30]朱振宏.新见两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志研究[M]//西域文史: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09-210.

[31]游自勇,赵洋.敦煌写本S.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M]//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65-181.

[32]毛阳光.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唐故太中大夫守安州都督府别驾上柱国乐陵县开国侯史(思光)府君墓志铭[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260.

[33]龙成松.《史乔如墓志》与阿史那氏谱系诸问题考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2):145.

[34]宋敏求.长安志:卷16:礼泉[M].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500.

[35]马驰.唐代蕃将[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43-158.

O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of Qu Siliang and His Wife, Mrs. Shi from the Royal Family of Gaochang Kingdom in the Tang Dynasty

Zheng Xudong Zheng Hongxiang Zhao Zhanrui

Abstract: The Qu family was once a royal family in Gaochang Kingdom, they were eventually relocat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when the Tang empire took over the Gaochang region in the 14th year of the Zhenguan era (640 CE)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When the Qu family entered the ranks of Tang society, they quickly joined the bureaucratic class and participated vigorously i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Tang government.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of Qu Siliang and his wife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ri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Qu family in the Tang Dynasty, including the titles and official positions that various members of the family achieved. The text of the epitaphs also imply that Qu Siliang and his father played key roles in important events of Ta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Wu Zetian,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a crown prince and Wu Zetian claiming her title as Empress. Qu Siliang's wife, Mrs. Shi, was the grand daughter of the famous Turkic general Shi Da'nai. Her epitaph not only supplements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Qu Siliang and the Shi family, but also provide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ir marriage and reveals both the changes in identity that people from frontier regions underwent when they assimilated to the Tang Empire, as well as the way that high-ranking families used marriage ties to maintain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Gaochang; Wu Zetian regime; Qu family; Shi family